

開拓使命——馬禮遜帶來香港教會的反思

胡志偉



今年適逢紀念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，全球各地華人教會紛紛舉行聚會，也是檢視基督教發展得失的合適時候。近年來，北美神學界與教會界就「使命教會」(missional church)掀起了不少討論。故此，筆者撰寫此文，嘗試從「使命」(missional)向度，檢視香港教會近十年來的發展。

使命優先

馬禮遜於1807年9月4日抵達澳門，三天後再到廣州，展開來華的福音使命。當時，在廣州沒有基督教教會存在；從馬禮遜的日記所見，每逢主日，他或獨自在家中敬拜，或與西方同工靜悄悄地聚會。由此可見，教會的向度不在於「場地」(place)而在於「子民」(people)，任何時候，神的子民兩三人在一起，教會的實義就在當中。

教會的存在是為了使命，這是現今大多華人堂會對教會的認知。誠然，在使命實踐方面，香港教會無疑在差傳或宣教事工有明確的增長。《2004香港基督教教會普查》反映，香港有1,181間堂會，會眾人口22萬601人，超過六成的堂會常設有差傳/宣教事工，反觀十年前僅有51.1%；其中37.6%堂會同時參與海外及大陸事工，亦有一些以本地宣

教為主(佔0.9%)。

1994年香港有宣教士估計為122名，至2006年則高達376位(數據引自「香港差傳事工聯會」)。2004年有341間堂會曾差派同工往外地事奉，806間堂會有定期的差傳奉獻，而設有專責差傳同工的堂會則有288間。2004年335間(近三成)堂會有蒙召準備當宣教士的會友，估計人數為713人。從上述數據反映，香港教會可算是全球華人教會社群中「使命」意識較強的，為不少宣教事工的先行者，這方面貢獻是值得肯定的！

從「向誰多給、向誰多取」的屬靈原則看，香港教會不能以這些數據為滿足。2006年的統計，專職宣教士280人，佔整體的七成五，而帶職宣教士有51人(佔13.56%)；若從「創啟地區」的角度來思考，這些地區根本不歡迎專職宣教士，而華人要進入這些工場，就要效法馬禮遜一般，尋覓其「東印度公司」廣州商館中文譯員的身份平台，才可享有合法居留，從而發展宣教工作的空間。

香港教會對全球宣教最大貢獻，在於香港教會的普世聯繫。自馬禮遜來華以來，香港一直扮演著面向中國福音化的一扇門戶，在地理、文化與商貿等方面，香港與中國緊密結連。香港亦有其獨特的



處境，曾為英國管治的殖民地達**150**多年，華洋雜處，不中不英；又於**1997**年回歸中國，成為「一國兩制」下的特區政府，繼續享有宗教與傳教自由。

香港不少教會由歐美宣教士來華後開展，如馬禮遜與中華基督教會的深厚淵源，不少堂會、基督教機構與差會、神學院又是普世教會之一分子；可見，香港教會的人脈或事工關係，正是教會的寶貴資產。

就筆者觀察，香港教會正不斷在全球教會中失掉了原來優越的位置，其中一項因素可能是「本位主義」過強。香港自回歸後，教會本質起了變化，不是「政治化」，而是「本位化」。教會本位主義越來越明顯，表現於大多堂會投放的資源，皆為著本身事工的擴展。筆者接受若干堂會在發展階段內，要自強健康，才能承載使命；但中大型堂會只務求本身增長得更快，信眾數目更多，而使命的理解只瘦化為「帶領更多人加入我的教會」，此種以「功能性」取代「本體性」的教會觀，正是筆者所批判的。

另一現象，可見於香港教會領袖參與國際性或地域性宣教與福音會議，越來越少。當全球跨國差會正探討強化夥伴關係，謀求在宣教工場上建立多元文化宣教團隊時，香港堂會及差會要敢於與國際差會強化其合作關係。「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」(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)主任 Todd Johnson，在其研究全球教會發展趨勢，指出基督教正在南移，**1900**年，八成基督徒住在歐洲與北美，**2005**下降至四成，至**2050**更降為三成；「基督教大多數」出現在南半球，而亞、非及

南美正是未來教會力量之所在。因此，香港教會不能失掉其全球視野，更不可失卻其普世教會的聯繫，要強化國際影響力，才能祝福冒起的中國教會。

香港教會獨特的角色，在於擁有豐厚的普世教會經驗，又同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城市，而香港教會能幫助及促進中國教會面向全球，走出去，並與全球基督教結連，成就上帝所交付的使命。

「使命教會」提醒我們，三一神在俗世的使命，有時透過地方堂會成就，有時也透過販賣鴉片的「東印度公司」來達成。使命領袖要有寬宏的胸襟，接受某些個人難以認同的事物，仍是上帝莫測的作為；國度使命永遠優先於教會，且大於任何一間地方堂會所能承擔！

進場文化

馬禮遜來華，除了完成第一部中文的《新舊約聖經》外，另一項重大的成就，就是主編了《華英字典》，對於中西文化之間溝通，有著重要貢獻；他的中文成就，可說是歐洲漢學家的第一人。他更是文化人；**1813**年**8月15日**出版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(*Chinese Monthly Magazine*)，這份刊物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，也是中文報紙的先導，內容除了聖經知識外，還介紹西方科學、法律和一些新知。馬禮遜明白福音要植根中國土壤，必須進入文化之中，使固有文化對福音開放而有所變化。

馬氏與米憐於**1818**年在馬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，培育人材，為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、訓練人

材之始。1843年理雅各把英華書院遷往香港，為香港及近代中國培育了不少人材，對中國近代社會、文化及科學，有莫大之貢獻。

宣教學者羅斯柏(Alan Roxburgh)在《使命領袖》(*The Missional Leader*)一書中，看教會領袖乃扮演詩人、先知與使徒三個不同的角色。詩人是人類經驗的演繹者、傳統的記憶者；他走進人世間芸芸痛苦中，細心聆聽，敢於疑問。詩人內心對一切世間問題，不是自命擁有答案，卻能善用各項文化符號、各種語文風格表達「道」的臨在，詩人的語言賦予了文化的意義與色彩。可惜的是華人教會一向不重文化藝術，香港教會培養不了詩人，堂會有的是「技術人」，於是我們失掉了魯益師形容的「經過洗禮的想像力」(*baptized imagination*)。

詩人亦是先知，運用「先知式想像力」(*prophetic imagination*)，引導上帝子民朝向上帝的異象，尋求神在此時此地的旨意。先知了解其宣講與行動，從來不會受到世人所歡迎；畢竟神的國度不被世人認同為世界的中心。先知受差派向世人宣講，真誠地與文化對話；即或受到排斥或拒絕，先知仍有承擔使命的勇氣。

最後，先知也是使徒，使命領袖有冒險精神，裝備信眾成為「受差派的子民」，在不同行業與場景中，積極面對且與文化對話。換言之，信徒倘若逃避場景帶來的挑戰，只喜歡躲在堂會內熱心事奉，這就是使命的失敗。

使命領袖敢於面向波濤洶湧的文化挑戰，脫離本身的「安全地帶」，與文化對話，不作任何迴避。華人教會領袖常對文化存有負面的批判態度，錯誤以為存著某種超然不吃人間煙火的「屬靈文化」，於是面對此時此地的文化挑戰，多以離場為上策。然而，使命領袖的文化觀，不是閉關自守，而是認定上帝是全地之主，世上每寸地土皆有神的痕跡；所有文化領域皆要更新變化，回復創造的榮美與和諧。他 / 她們樂意與文化對話，而不是一味指責與否定世俗文化的不是。

《2004香港基督教教會普查》數據顯示，56.3%堂會有提供社會服務，顯著高於1999年同類調查的41.5%。香港教會一直以來，在辦學方面佔有一定的比重；中學127間，小學120間，學前教育/幼兒服務也有221間。基督教學校提供的全人教育，塑造港人的文化素質，起著默默耕耘，移風易俗的影

響力。基督教按香港整體人口只佔3.3%，但教會透過教育、醫療與社會服務，享有美好的聲譽，及累積寶貴的經驗。香港教會較諸其它華人社群，擁有多數的神學院及出版社，然而在文化使命的開拓卻遜色於過往。我們的資源分配失衡，形成出版書刊面向信徒居多，而走進公共空間的卻少了！

使命領袖對身處的文化，有文化素質的視野，領袖的角色不再是修補現有問題的專家，卻是有想像力與富創意的文化塑造者、未知領域的拓荒者。倘若教會領袖的景觀，只以本身團體的利益作出發點；對於公共空間或文化的參與，頂多抱著「支持別人去做」的心態，難怪有意義卻不立即見效的文化戰線，越來越少基督徒參與！教會領袖要擺脫悲嘆公共空間之內基督教文化的失陷，我們更要反省：「身為神的子民，我們究竟在俗世文化中展示了多少從信仰而來的價值？」

總結

馬禮遜來華宣教之時，面對困難重重，受著政治的限制、文化的差異、環境的惡劣、國民的不信任與猜忌，但他無畏地持守福音精神，在不同領域(傳道、譯經、翻譯、印刷與出版、辦學等)奠下堅實的根基。

筆者看馬禮遜留下最寶貴的不僅是歷時13年(1810-1823年)才完成的首本中文聖經譯本，更是他那顆視死如歸、勇於開拓而又堅忍不拔的心志。

兩百年後，華人教會在不同層面的發展，有了顯著的成就，但香港教會反而在豐富的資源下，失掉了向未得領域開拓的心志。香港教會在使命實踐方面，最美好的莫過於2003年的「非典事件」(SARS)爆發，使命信徒不逃離現場，積極在災難當中，展示基督的臨在。災難過後，大量中年人士返回教會，就是使命的成果！

面對全球與中國宣教的挑戰，香港教會不能安逸於現狀，或關注只在個別宗派或堂會的增長，我們要進一步思索：「華人教會在全球基督教進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？」

我們有否培育像馬禮遜一樣心志的使命信徒，進入不同的場景，實踐國度使命？筆者撰寫此文，期盼神在我們中間興起有馬禮遜心志的信徒，走進異文化當中，同樣留下可供後人推崇的佳美腳蹤！

(作者為香港更新運動總幹事)